

身份再造：天津解放初期政府对乞丐问题的治理^{*}

夏 雪 邱小云

〔摘要〕天津解放初期，在各种复杂原因的交织下，市内乞丐竟畸形增加，影响社会安定及商业经营，加之部分生活困苦的乞丐亟待政府救助。有鉴于此，天津市人民政府站在社会改造的高度，在改造人的思路下，先分类分期突击收容市内乞丐，继而对其进行严格有效的审查管理，最后通过教育改造的方法，仅用数月时间即基本肃清了流落天津市面的乞丐，使乞丐这个异质性群体回归到正常社会秩序中而逐渐退出了天津社会舞台，解决了天津市的一个严重的历史上从来不能处理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实力也因此得到了天津市民的普遍认同。天津市人民政府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解决这个历史顽疾，主要是因为先进的中共拥有并且能够灵活运用重塑思想、改造文化及再造身份这三大改造手段。

〔关键词〕改造乞丐；重塑思想；再造身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1)05-0103-9

时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社会群体视为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有效视角，认为“从社会群体的交错流变及其与近代社会转型的相互作用去剖析中国社会，不仅使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化，而且具有史学范式转换的意义。”^①在这种认知下，中外学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处于底层社会的近代中国乞丐群体，“让历史在演绎天下大势的时候，也能够给予过去的普通人一个舞台”^②，史学研究因而变得更加生动、丰满而精彩。已有研究成果多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该群体本身^③，鲜有分时段考察不同地区的乞丐治理问题^④，尤其对各大都市解放初期新政府的乞丐治理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即便有学者关注于此，也多注目于北京的乞丐治理问题^⑤，而将天津解

*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研究”（17ZDA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章开沅在2005年于苏州举办的“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郑成林、魏文享：《“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2006年第3辑，第92页。

② 章开沅：《章开沅文集》第10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7页。

③ 岑大利、高永建：《中国古代的乞丐》，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版；卢汉超、任云兰：《城市人：近代上海的乞丐和游民》，《城市史研究》2000年；邓小东：《略论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刘海岩：《近代天津乞丐的构成、行为及其城市遭遇》，《城市史研究》2004年；关文斌、任吉动：《近代天津的穷家门：行乞与生存策略论述》，《城市史研究》2004年；周德钧：《乞丐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卢汉超：《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曲彦斌：《中国乞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

④ 付燕鸿：《政府维度：近代天津乞丐治理研究》，《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

⑤ 白云涛：《北京解放初期对社会游民的收容改造》，《北京党史》2000年第2期；李小尉：《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乞丐的救济与治理》，《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廖胜平：《北京解放初期对乞丐的收容与改造》，《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靳飞：《建国初期北京市对乞丐的收容与救助》，《兰台世界》2013年第28期，等。

放初期新政府对乞丐的治理视作中共治理乞丐问题^①或天津解放初期社会治理^②的一小部分而简单论述之，侧重于历史事实的记叙^③，鲜有从社会改造的角度来思考。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走进历史场域，从社会改造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天津解放初期政府对乞丐的治理问题。

一、现实需要与主观诉求：教育改造乞丐的缘起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这个饱受国民党摧残和列强蹂躏的华北巨埠终于回到人民手中，旧社会开始死亡。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如乞丐问题，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显得十分突出，使得处理乞丐问题变得尤为迫切，主要表现在：

乞丐数量庞大、成分复杂，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乞丐，“在中国有史以来，算占最多的记录”^④。到了民国时期，北平、天津虽为富庶之区，“然乞丐种类之多，实集中国之大成。”^⑤1930年，仅在天津特别市旅居了二十多天笔名为培根的外乡人所看到的便是，“现在天津无论走到那条街上，都有乞丐跪在地上掏钱，或跟着跑来要钱”，并认为天津乞丐之多实际为全国之首^⑥。1934年，据天津社会局调查，全市共有乞丐逾2万人^⑦。天津解放后，天津人民政府因为忙于城市接管工作，对处理乞丐的工作无法兼顾，同时在政策宣传解释上也做得不够，使得部分乞丐误解“解放”，在曲解“共产党为穷人”、“穷人翻身”的思想下强逼恶讨，乞丐日可收入多则四五百元，少则逾百元，除去占据他们花销“半壁江山”的50元食宿费及10元左右的香烟费，他们尚有大部分余钱，“不但吃肉喝酒，还可以吸烟赌钱，甚而至于嫖妓”^⑧。乞丐的收入竟比苦力及一般的小商贩的收入还要高出几倍，因此，有些贫苦的洋车夫、三轮车夫和城市里的流氓纷纷加入乞丐之列，以致天津市的乞丐畸形增加，全市乞丐总数竟高于解放前。据1949年4月天津政府的调查，全市约有乞丐1.5万人^⑨。这个数字在向社会预警，因为“社会里有了乞丐，就是社会不安定的现象”^⑩。

除此而外，这些乞丐的成分还十分复杂，简单论之，可分为三类：职业乞丐、半职业乞丐和临时性乞丐。职业乞丐里有儿童、青壮年、老年、残废。半职业乞丐则多是拾破烂的孩子、小偷、二流子、贫苦妇女、失业工人、老弱三轮车夫的家人以及河边的码头短工等。天津解放前夕，国

① 吕晨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主要城市社会问题及其治理（1949-1957年）》，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高慧：《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乞丐问题的治理及其历史经验》，天津商业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靳忠泽：《天津解放之初的社会接管和治理研究（1949-1952）》，天津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②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公安局编：《难忘的岁月——天津市解放初期的社会治理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刘宋斌：《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1945-19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天津市档案馆主编：《旧天津的新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

③ 周利成：《天津市收容乞丐纪实》，《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

④ 石克士：《乞丐问题之讨论》，《市政月刊》1931年第4卷第10期，第1页。

⑤ 《社会的下层——平津一代乞丐的生活——分类共有11种且有团体及规约》，《大公报（天津）》1933年1月6日，第11版。

⑥ 培根：《谈谈天津特别市乞丐问题》，《津声》1930年第2卷第2期，第1页。

⑦ 《天津全市乞丐达二万余名为肃观瞻大举搜捕》，《益世报（天津）》1934年8月9日，第5版。

⑧ 本报记者卢贤千：《乞丐的改造》，《进步日报》1949年5月30日，第3版。

⑨ 《天津市民政局关于收容处理乞丐工作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页。

⑩ 竞存：《乞丐在天津》，《一四七画报》1947年第15卷第7期，第11页。

国民党匪军曾在市郊纵火大烧民房16970.5间^①，致全市25.9万余居民流离失所^②，部分灾民临时沦为乞丐；由东北等地溃逃下来流落在津市街头的国民党匪军散兵伤俘有近2万人^③，大部分无食无宿，更无法获得治疗，亦沦为临时乞丐^④；过去由山间逃亡来的地主富农、破产的手工业工人、少数的游民和流氓等多为临时性乞丐。如此数量庞大且成分复杂的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天津的社会秩序。

同时，解放初期天津乞丐的强讨恶要严重影响了商业的正常运作。三类乞丐中，职业乞丐最为霸道，他们有秩序地按时按点工作，住在市郊的乞丐上午坐电车到市区集体乞讨，白天向一般商店讨钱，傍晚将乞讨目标转移到饭馆，夜里则去妓院要钱。讲工作效率，给慢了便要求商家加钱。倘若商家不给钱，还会遭到乞丐们的报复。如华安大街一个鞋店因为乞丐多要不给便遭到一群乞丐在店门抹屎的报复。因此，面对乞丐们的强讨恶要，商家或因不明政府对乞丐的政策或因担心乞丐报复，往往选择乞丐要多少便给多少，甚至预备一个专门的伙计打发乞丐。有的商家因为缺乏零票，只好自制4元以内的临时支票，或用水牌子、电车代现券顶零。1949年5月初，天津《进步日报》的记者卢贤千特意去天津南市做了调查，发现永聚祥鞋店每天经常要打发乞丐近500元，初一十五要到1000元；在鼎盛酱油公司开门前2分钟内，过了7个乞丐；惠利鞋店7分钟内过了26个乞丐；在一条有62家商店的街上，同时有54个乞丐经过。有的乞丐头竟在所谓的“两利”原则下，与商人商量“包街”，这俨然成了“乞丐捐”^⑤。戴林春线店每天应付乞丐的费用高达700元，而该店日营业额仅为600元。因此，戴林春线店、庆兴钱庄及华丰鞋店等商铺皆因无力承担乞丐们的强逼索要而被迫关门歇业^⑥。可见，乞丐们强讨恶要的行乞活动已经严重影响了商户的商业经营。因此，部分商户联名上书天津市人民政府，并派代表到民政局表达他们希望政府能治理乞丐问题的强烈诉求，天津商会亦表示愿意支持并协助政府共同解决乞丐问题。不良乞丐对天津商业造成的恶劣影响及以天津商界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关于处理乞丐问题的诉求，引起新政府的高度重视，深知应尽快处理乞丐问题。

从天津市的生产建设而言，乞丐亦成为市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1948年10月天津市民政局统计，不包括外侨户口在内，全市人口将近200万^⑦。彼时全市有交通运输工67955人、码头工1105人、旅店工人5140人等，加之靠他们生活的家人，至少有50万人失业^⑧。质言之，天津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天津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天津解放之初，天津市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城市工作做好，而做好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⑨。这就需要把大量的消费人口转入到生产队伍中，乞丐即属于消费人口。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4月，天津全市约有乞丐1.5万名，而仅在七区462名乞丐中就有133人是没有残废的，这133人中则有102人是16岁到50岁的有劳动能力的男子^⑩。简而言之，这些有劳

① 《天津市民政局1949年全年社会救济工作情况（1949年12月）》，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接管史录》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页。

② 《四乡粮食菜蔬源源入市 天津工商复业物价平稳 民主政府发放赈粮救济灾民》，《人民日报》1949年2月5日，第3版。

③ 《津市人民政府 妥善处理敌散兵游勇》，《人民日报》1949年2月10日，第1版。

④ 《天津街头饥饿的一群 在南方被抓丁到东北卖命 受伤后被遗弃流落为乞丐》，《人民日报》1948年12月6日，第3版。

⑤ 本报记者卢贤千：《乞丐的改造》，《进步日报》1949年5月30日，第3版。

⑥ 周利成：《档案揭秘——近现代大案实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⑦ 《十月份人口统计将近二百万》，《大公报（天津）》1948年11月12日，第5版。

⑧ 《平津的两大问题 失业问题和粮食问题》，《益世报（天津版）》1949年1月3日，第1版。

⑨ 《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9年3月17日，第1版。

⑩ 本报记者卢贤千：《乞丐的改造》，《进步日报》1949年5月30日，第3版。

动力的乞丐是有可能也急需成为生产者的。

事实上，强讨恶要的职业乞丐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残废、老弱的“善乞”是因残酷剥削而流于破产的人员，他们仍生活在困苦中，内心希望获得政府的救助。天津乞丐最聚集的地方是六、七、八、九、十一各区，他们有的住在市郊的窝铺里，部分住在西广开、三不管、地道外的小店里，还有的乞丐住在北站外和西车站的贫民区里，有些就露宿在街头上。而在天津南市的几家狭窄、昏暗、气味浑浊的乞丐店里，几张两层床铺上经常挤满着四、五十名乞丐，66岁的失业手艺人张秀森便是其中之一。他原是手艺人，半年前因商家倒闭而失业，只得领着13岁的孩子乞讨，因不会要钱，加之他每天要出20元店钱，还要吃两顿饭，过着困苦的生活^①，急需政府救助。一言以蔽之，从主观意愿上来看，部分乞丐也希望人民政府介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综上所述，天津解放初期，无论是从市政建设的客观需要考虑，还是遵循乞丐的主观诉求，乞丐问题都成为新政府急需处理的问题。那么，该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一社会顽疾呢？人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改造的高度进行乞丐问题的社会治理，在改造人的思路下改造天津乞丐便成为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急务之一。

二、收容与审查：教育改造乞丐的基础

收容乞丐是教育改造乞丐的基础。天津解放初期，全市乞丐多而散，若想将乞丐尽可能完全纳入社会改造的范围之内，就必须对乞丐进行集中收容。鉴于职业乞丐是乞丐中最霸道、最复杂、最难应付的一种，天津市公安局事先对全市职业乞丐进行了近2个月的调查教育和思想宣传。为加强对该市乞丐的收容和管理，天津市民政局则数次召集市级各有关部门与各区区长、民政股长会议，研讨各项具体办法，最终决定由民政局、工商局、公安局及华北区救济总署等单位参加组成的“天津市乞丐收容处理委员会”（后文简称“丐委会”）统一领导办理收容及处理乞丐各项事宜^②，按照《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采取“一面收容，一面处理，逐渐肃清”^③的方针，拟由五处临时收容所对全市的乞丐展开大规模的突击收容，并由市公安局纠察总队负责规劝入所。收容所内的工作人员则由民政局及有关机构调集干部50名充任，人员不足时，丐委会可约请各业公会派员临时协助乞丐收容所办公。此外，为纠正部分干部不愿当“花子头”等的错误思想，丐委会领导召开了多次委员会干部会议，进行反复的思想动员，5月24日上午，又特在民政局召开各所全体干部思想动员大会^④，使得干部们逐渐认识到收容处理乞丐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艰巨复杂的新工作”^⑤，并一直保持着饱满高涨的工作情绪。

经过多日积极筹备，1949年5月25日，全市收容乞丐工作正式启动。为了稳重慎重起见，避免拥挤混乱的情况出现，五处收容所采取分类、分期的收容办法，从5月25日至5月28日，先收容了有劳动力的乞丐、以授徒为业的乞丐头以及职业乞丐共计464名^⑥，其中大部是有劳动力的^⑦，

① 本报记者卢贤千：《乞丐的改造》，《进步日报》1949年5月30日，第3版。

② 《北平、天津市人民政府安置改造乞丐》，《新华社电讯稿》1949年新343期，第6~7页。

③ 《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人民日报》1949年5月23日，第2版。

④ 《登记收容乞丐》，《进步日报》1949年5月24日，第3版。

⑤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接管史录》（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4页。

⑥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公安局编：《难忘的岁月——天津市解放初期社会治理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周利成：《档案揭秘——近现代大案实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⑦ 《平津乞丐全面收容 各商号可停施舍劝导乞丐入所 乞丐入所后顾虑消除迅速转变》，《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第3版。

仅前3天就收容了264名青壮职业乞丐^①；从5月29日开始，展开全面收容工作，除真正转业的乞丐外，凡老幼、残废、妇女等均在被收容之列，第一天内即收进乞丐260人^②。截止6月3日，各收容所收容乞丐总数为965人，其中青壮年454人占比高达47%，老弱319人，残废151人，幼童40人，婴儿1人^③。经过十几天的全面收容，游客所见到的天津已是“各处街道打扫清洁，乞丐一个不见”^④。从5月25日至7月31日，全市五所收容所共计收容乞丐1594人，男1360人，女234人^⑤。天津街头的乞丐已基本肃清，天津市乞丐收容处理委员会遂于8月10日正式撤销，乃由市生产教养院接手后续的乞丐收容工作至年底。从1949年5月25日至12月底，天津全市共计收容乞丐3187人。其中，42%为失业人口，难民占总人数之19.7%，职业乞丐占比则为18.8%，11.8%的乞丐属于无奈滞留天津而无法生活者，还有4%的人员属于国民党散兵。至此，在天津市，基本再无职业乞丐。

与收容工作几乎同时进行的则是乞丐入所后的审查管理。为了迅速且恰当地处理乞丐问题，6月1日下午，天津市乞丐收容处理委员会即召开第二次各收容所所长联席会议，说明全面收容工作已告一阶段，下步工作则是根据一面收容一面处理、迅速收容迅速处理的精神进行审查处理并加强教育改造。于是，各收容所开始着手处理审查乞丐的工作。然而，乞丐是混合收容入所的，入所的乞丐有“男、女、老、弱、疯、傻、残废、失业工人、知识分子、妓女、逃亡地主、小偷，极其复杂”^⑥，若不分类编制是难以审查管理与教育改造的。天津市乞丐收容处理委员会遂根据乞丐的性别、年龄、体力把乞丐们分成妇女、老弱、残废、青壮年、儿童五类，于6月7日将有劳动力的青壮年乞丐、乞丐中的妇女婴儿及老弱幼儿男子分别集中至第三、二、四收容所等待审查处理并加强教育改造^⑦，另将部分残废乞丐送入救济院^⑧，令第一、五两所继续收容乞丐。为便于管理，各所再将所内的乞丐分成若干个10人小组，以华北人民政府委派的荣军干部为小组长。审查时，各干部重点审查乞丐的类别、本市有无家室之累、历史成分、准备如何处理等。至于审查的方法，收容所的干部们首先是深入动员乞丐，向他们详细说明审查的目的；接着通过发现培养积极分子让其带头在小组内发言报告自己的基本情况、召开乞丐诉苦大会等形式，设法消除他们怕查历史成分的顾虑，努力使乞丐主动说明自己的过去；继而再找仍有顾虑的乞丐进行个别谈话；最后，对家在本市的乞丐进行实际调查。通过如此审慎的审查制度，收容所干部们搜集了乞丐们很多宝贵的材料，如第五收容所的职业乞丐宋雁和的过去^⑨。但也因为审查不细致，竟使得“有家可归的8个残、老的也送到生产教养院去”^⑩。

收容是为了尽量将全市乞丐聚集起来，便于教育改造乞丐；审查则是为处理乞丐做准备，以

① 《天津市民政局关于收容处理乞丐工作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页。

② 《津收容乞丐已逾七百名 老弱残废乞丐即送入救济院》，《进步日报》1949年5月30日，第3版。

③ 《津入所乞丐庆翻身 组织秧歌队今天出街表演 收容九六五人 半为青壮年》，《进步日报》1949年6月5日，第3版。

④ 《新天津见闻录》，《大公报（香港）》1949年6月20日，第7版。

⑤ 《天津市民政局关于收容处理乞丐工作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⑥ 《天津市民政局关于收容处理乞丐工作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页。

⑦ 《津入所乞丐庆翻身 组织秧歌队今天出街表演 收容九六五人 半为青壮年》，《进步日报》1949年6月5日，第3版。

⑧ 《津市收容所乞丐编成劳动大队 经过教育建立了劳动观点 即参加清除河岸垃圾工作》，《进步日报》1949年6月13日，第3版。

⑨ 周利成：《档案揭秘——近现代大案实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⑩ 《天津市民政局关于收容处理乞丐工作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页。

便将来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去处，皆是处理乞丐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教育改造乞丐才是关键。

三、对乞丐身份的再造

改造寄生思想，强化劳动观念是重塑乞丐思想的有效手段。一般乞丐因长期不事生产而养成了依赖性，尤以职业乞丐的寄生思想最为强烈。职业乞丐们时常“集体学习”，“交流工作经验”——怎样要得多、要得好，不以不劳而获的乞讨生存方式为耻辱。天津乞丐人数最多的祁门的花子头李明山则秉持着“没有乞丐就不成世界”^①、“乞丐要饭天经地义”的观念。然而，“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好逸恶劳，而是所有的人都诚实劳动，不是为别人去劳动，不是为富豪和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劳动。”^②显然，乞丐的寄生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劳动观格格不入。因此，天津市人民政府改造乞丐的基本原则是“一般乞丐务使其学习一种技术，谋求正当生活，凡是经过改造教育，有了谋生能力，准许其自由谋生，或为其介绍适当职业；但对于职业乞丐，决严加管教，强制其参加劳动生产，使其彻底认清劳动是光荣的，逐渐消灭其寄生思想，以安定社会秩序。”^③为达其目的，各收容所在管教合一的精神下，采取“上大课讲、分小组讨论，漫谈的方式”^④，对所内的乞丐施行包括阶级教育、政策教育、纪律教育以及劳动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乞丐树立社会主义的劳动观和人生观。

经过两周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造，一般乞丐在思想行动上均有了显著的进步，已开始转变寄生思想，逐渐认识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决定要“重新做人，在毛主席领导下劳动生产”^⑤。经过45天的教育后，大部分的乞丐都树立起劳动生产的观念，以讨乞寄生为耻辱，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亦有显著提升。

天津解放之后，摆在天津市人民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加强新文化建设，让人民在文化上翻身。然而，“在行为方式上，乞丐闲散放逸、得过且过、苟且无赖、居无定所、不事产业、及时行乐、消极无为、颓废顽愚、玩世不恭；在价值取向上，乞丐重利轻义、鄙薄伦常、侥幸投机、是非模棱的价值取向；在习俗与信仰中，乞丐实用、荒诞、媚俗这些共同形成了乞丐文化的内涵”^⑥。显然，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变态文化^⑦——乞丐文化与新文化建设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是必须改变的。因此，天津市人民政府在重塑乞丐思想之余，亦关注对乞丐文化的改造，让乞丐们接受新文化的洗礼。

一般乞丐多是文盲，为了提高乞丐的文化水平，各收容所还教乞丐们识字、写字，给他们读报^⑧，让他们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努力做一个有文化的人。第四收容所即组织了黑板报，教乞丐识字^⑨。6月5日，第五收容所乞丐秧歌队的队员们被八、九区商民热烈欢迎他们的行为所感

① 本报记者卢贺千：《乞丐的改造》，《进步日报》1949年5月30日，第3版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3页。

③ 《把寄生者变成生产者！平津将强制乞丐生产》，《人民日报》1949年5月9日，第2版。

④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接管史录》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6页。

⑤ 《乞丐变新人 感动人的场面》，《进步日报》1949年6月6日，第3版。

⑥ 王俊编著：《中国古代乞丐》，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⑦ 曲彦斌：《中国乞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⑧ 《天津收容乞丐获极大成绩》，《新华社电讯稿》1949年新393期，第8页。

⑨ 《平津乞丐全面收容 各商号可停施舍劝导乞丐入所 乞丐入所后顾虑消除迅速转变》，《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第3版。

动,乃用书信的形式表示感谢^①。可见,他们已经能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第三收容所的干部则把乞丐编成队,给他们读《天津日报》上的《对乞丐问题的解答》^②,向他们解释新政府对乞丐的政策。

此外,收容所还组织乞丐们参加各种新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鼓励他们用新的文化艺术展现自己获得新生的欢乐之余亦为人民服务。如各收容所组织乞丐成立了秧歌队,并两次带领他们到街头演出,让乞丐开始崭新的文化生活。如6月5日下午,各所乞丐秧歌队300多人为庆祝自己翻身及青岛解放,同时分路出动经过大小六十多条街,高喊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们要参加生产,重新做人”等口号,以唱歌、快板、讲演、小调、数来宝等新鲜的节目向市民们表达了他们翻身解放的快乐。再如第一收容所张明义在罗斯福路上唱道:“胜利大旗红遍了天,毛主席他救了咱,从今以后不要饭,大家一起来流汗。”乞丐秧歌队的倾情演出深受天津市民的欢迎与赞赏,许多商号摆出了丰富的食品和日用品、八区针市街公益脚行和聚恒杂货庄等则用鞭炮欢迎第五收容所的秧歌队。这让该所乞丐们深感愧疚和感动,特写信给八、九区的商民,表示感谢^③。各种节日及纪念日,历来是各族群众认可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文化活动,亦是以往乞丐们乞哀告怜的良辰吉日。然而,在举国欢庆青岛解放的日子,乞丐们不再是自私地使出浑身解数只为求“施舍”而是选择用秧歌表演的文化艺术来挥洒激情、表达快乐,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生活,生存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

乞丐歌谣是乞丐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有鉴于此,用新歌代替乞丐歌谣便成了改造乞丐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说来宝,是流行于京津地区的一种大众化的说唱形式,因北平称急快的念唱为“数”,遂又叫“数来宝”,是乞丐要钱时现编现唱的顺口溜或歌曲。乞丐入所后,各所干部即教他们唱新歌,乞丐们亦主动编写了新内容的数来宝,用新的歌谣称赞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如第五收容所乞丐康焕朝自己编了顺口溜:“说的是解放区晴了天,共产党领导讨要的把身翻!”^④可见,各收容所通过加工改造数来宝的歌唱内容,一方面使数来宝从此呈现的不再是乞丐文化而是新文化,一方面亦加强了对乞丐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行为是文化的最外显形式,乞丐行为即承载着乞丐文化的基本精神。“乞丐行为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庸俗取向的文化表现”,“充饥、果腹、活命、生存”^⑤是乞丐行为的唯一目标,单方面的索取、乞讨则是乞丐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乞讨行为又带有明显的江湖习气及流氓地痞风气。因此,天津解放初期,部分乞丐蛮横无理强讨恶要,为逼迫商家“施舍”钱物,乞丐耍赖故意在门口拦阻顾客;面对不肯破钱免灾的商家,乞丐便用在门上涂抹粪便等卑劣手段报复商家。鉴于此种情况,改变乞丐行为自然是改造乞丐文化的关键。在新文化的耳濡目染下,乞讨已不再是他们的主要行为,“过去他们要饭给少了,不行,今天给东西都不要了”。以往乞丐随身携带的是卦打板、合扇骨、号筒子、三道劲、铁链子、铃铛、要钱钟等乞讨的用具,而6月22日上午乞丐秧歌队第二次在街头演出时,乞丐们“一律头包白毛巾,扛着镐、铤、锄、四齿耙,背着筐,担着篮”^⑥。

① 《乞丐变新人 感动人的场面》,《进步日报》1949年6月6日,第3版。

② 《乞丐百余昨续入所》,《进步日报》1949年5月27日,第3版。

③ 《乞丐变新人 感动人的场面》,《进步日报》1949年6月6日,第3版。

④ 《平津乞丐全面收容 各商号可停施舍劝导乞丐入所 乞丐入所后顾虑消除迅速转变》,《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第3版。

⑤ 周德钧:《乞丐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⑥ 《乞丐变新人 感动人的场面》,《进步日报》1949年6月6日,第3版。

由上观之，各收容所根据乞丐文化的内涵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文化改造，让乞丐除了生存之外开始追求多样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生活，使得数来宝不再是乞丐谋生的手段而成为新文化的载体之一，乞丐文化逐渐渐灭。

“人口的游民化以及游民的阶层化都源于生活的无保障。”^①作为游民中的一部分^②，乞丐的产生亦是如此。尤其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乞丐之所以激增，只因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经济破产使其失去了劳动的条件又得不到劳动的机会，才致流落街头，行乞度日。如流浪乞丐于瑞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分有一条路，谁干这个”^③。有鉴于此，天津市人民政府本着既改造又负责的精神，在重塑其思想、改造其文化之后即设法使乞丐具备劳动条件再赐予其劳动机会，为乞丐再造身份，将他们由乞丐变成劳动人民，使他们在新的社会里做一个新社会的人。

对于无任何劳动能力的老弱残废乞丐，收容所一般是令其在可能的范围内学习技艺，让其具备基本的劳动条件，使其能独立谋生^④。家在本市的352名乞丐，经过教育改造后，则由其家属取保回家，自谋生活^⑤，他们中的部分人后通过在市区打扫垃圾赚取生活费^⑥。至于有家可归的外籍乞丐，收容所则将其遣送还乡，分地生产。集体遣送前，收容所对乞丐们进行了返籍生产的思想动员，故210名回籍的乞丐皆是自愿自动回籍。收容所还设身处地为乞丐们着想，给予他们周到的照顾。如将同地区的乞丐分在同一小组集体遣送，为他们购买回家车票及干粮吃食。为减少乞丐回乡后从事生产的阻力，收容所还发给每名回籍乞丐证明书、介绍信和胸章。乞丐们感激异常，承诺回家后定努力生产，以报答政府的好意^⑦。

事实上，有劳动能力而无家可归的青壮年乞丐是天津市人民政府的重点劳动改造对象。6月中旬，天津市第三收容所内有劳动力的495名^⑧青壮年乞丐，经过积极的教育改造，很快便树立起劳动观念，要求参加劳动。对于仍处于改造中的乞丐们而言，自是集体劳动更适合他们。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劳动才适当呢？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接收了原河北省农田局下属的芦台等农区，但芦台农场的移民居住宅及扬水设备被破坏无余需人员恢复，广大荒地亦急需大量人员前往开荒^⑨。与此同时，天津市海河、南运河、子牙河等河流正处于汛期，但以上各河沿岸住户数年来任意向河岸倾倒垃圾达四万余方，致使河流的排洪量受到限制，流水不畅，易生危险。此外，堆积如山的垃圾不但将河身挤窄，而且经水流的冲洗，大批垃圾沉淀河底，河床被抬高，使得船只航行非常不便。因此，防汛委员会决定邀集工务局、民政局、公安局共同组成清除河槽垃圾工作队，再雇工数百名从事清除垃圾工作^⑩。

有鉴于此，根据乞丐的意愿，第三收容所将所内有劳动力又无家可归的463名青壮年乞丐编成市内和市外两个劳动大队，分别安排了工作。市外劳动大队198名乞丐经华北人民政府介绍于

① 杨丽萍：《论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对社会异质性的消解——透过上海游民改造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② 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广州）》1926年第1期，第19页。

③ 本报记者卢贤千：《乞丐的改造》，《进步日报》1949年5月30日，第3版。

④ 《津收容乞丐已逾七百名 老弱残废乞丐即送入救济院》，《进步日报》1949年5月30日，第3版。

⑤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接管史录》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4页。

⑥ TIENTSIN BEGGARS GIVEN WORK.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64-1951) 1949年8月3日，第2版。

⑦ 《天津市民政局关于收容处理乞丐工作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

⑧ 《津市收容所乞丐编成劳动大队 经过教育建立了劳动观点 即参加清除河岸垃圾工作》，《进步日报》1949年6月13日，第3版。

⑨ 《津沽农垦区介绍》，《人民日报》1949年6月25日，第4版。

⑩ 《河槽垃圾后天开始清除 调用乞丐及僱工六百人工作 由民船代运 预计一月可完工》，《进步日报》1949年6月20日，第4版。

7月赴芦台农垦局从事开垦生产^①，使得原乞丐成了农场的工人，成为光荣的拓荒者与建设者。他们过着完全自由的劳动生活，月薪150斤米，除饭费的花销外，工资尚有部分剩余。因此，他们“对农场抱着极大的光明希望，决心在哪里安家立业，参加终生的劳动”^②。市内劳动大队265名乞丐则留在市内以光荣的劳动人民姿态参加清除海河、南运河、子牙河河槽垃圾的工作^③，由政府给予劳动报酬，“每一队员在一个月的劳动中，都积蓄了一些钱，并购置了一些东西”^④。

经过教育改造，已树立起劳动观念的乞丐们，在人民政府赐予他们劳动机会后，再次被纳入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从事集体劳动。乞丐们在长期生产中改造思想，通过劳动得到相应的报酬而获得了经济的独立。如此，乞丐们的职业身份、政治身份及经济身份都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旧社会的乞丐而是新社会里光荣的劳动人民。至此，作为一种社会异质性群体的乞丐逐渐消失于天津社会中。

结 语

“人的改造是整个社会改造中最新、最困难的一环”^⑤。乞丐则是游民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⑥之一。因此，改造乞丐自然绝非易事，尤其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天津解放初期。然而，天津市人民政府在做了充分准备工作的前提下，先是成立专门收容机构对乞丐予以分类分期的突击收容，继而对收容所内的乞丐开展了严格有效的审查管理，最后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先导消灭其寄生思想、以去文化化为根本改造其消极文化、以参加劳动为关键塑造其身份，仅用数月时间，就基本肃清了流落天津市面的乞丐，使乞丐这个异质性群体回归到正常社会秩序中而逐渐退出了天津社会舞台，解决了天津市的一个严重的历史上从来不能处理的社会难题，稳定了天津市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本文作者 赣南师范大学“赣南苏区与红色文化研究”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赣州 341000；

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赣州 341000）

〔责任编辑：王昌〕

① 《津青壮乞丐赴芦台开荒》，《市政建设》1949年第1卷第3期，第25页。

②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接管史录》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7页。

③ 《从此结束寄生 津乞丐开始生产》，《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7月3日，第2版。

④ 《天津市民政局关于收容处理乞丐工作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

⑤ 粟迎春：《斯大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⑥ 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广州）1926年第1期，第19页。